



# 朱熹文章风格论

闵泽平

(浙江海洋学院 人文学院, 浙江 舟山 316000)

**摘要:**朱熹声称平生最不喜作文,却是南宋一代文章大家。其奏疏之作,往往有高屋建瓴的气势,行文简易而意气凛然,不动声色而林茂深严,使人难于辩驳。其序跋之类条分缕析,无褊躁激切之论,无艰涩炫目之辞,清明峻洁之中,自有雍容俯仰之态。其书、记之作,落尽英华而返璞归真,将俊健奇伟出之于条畅洞达,语简意闲,神定气和,充分展现出朱熹冲夷和穆的宗师风采。

**关键词:**朱熹;雍容;文章;平和;冲夷

**中图分类号:**I207.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07)05-0147-05

朱子之学体大思周,远绍孔、孟,近综周、程,旁揽二氏,集理学之大成,卓然自成一家。朱熹少时以兴起斯文为己任,终其身孜孜矻矻,人文物理,罔不究心,曾自言“某旧时亦要无所不学,禅、道、文章、楚词、诗、兵法,事事要学”<sup>[1]卷一〇四,3438</sup>。作为理学大家,其学虽大抵以穷理致知、反躬践实为主,对于文学不无防僻惧淫之心,但“道理文章,原是一事”,圣人之道,本心以穷理,顺理以应物,豁然会通,表里相济,精粗俱到,故朱熹于经史子集偶一涉猎,亦成方面大家。朱熹也重道轻文,不过观念远比周、程等人通达。他强调法度,也不反对自出新意、自铸伟辞,只是要求“变而不失其正”。他标举平淡,却反对淡而无味,希望“枯淡中意思”<sup>[1]卷一三九,4333</sup>。他不仅具有敏锐的鉴赏力,批评各家各派文章颇为中肯,而且所写文章“疏豁高朗,条理井然”,被周亮工《尺牍新钞》誉为“天下之至文”<sup>[2]</sup>,钱穆也曾感叹“朱子倘不入道学儒林,亦当在文苑传中占一席之地”<sup>[3]朱子之文学,1714</sup>。

朱熹以一代宗师自许,为人安详、雍容,论文亦力主中正平和。他认为“文章须正大,须教天下后世见之明白无疑”<sup>[1]卷一三九,4318</sup>。为此,他褒扬欧阳修之文未散“和气”、“恁地安详”,称赞“韩无咎文做著尽和平,有中原之旧,无南方啁哳之音”<sup>[1]卷一三九,4310</sup>,肯定“欧公文字敷腴温润,曾南丰文字又更峻洁,虽议论

有浅近处,然却平正好”<sup>[1]卷一三九,4302</sup>,批评苏轼之文“便伤于巧”,认为“李泰伯文尚平正明白,然亦自有些巧了”<sup>[1]卷一三九,4303</sup>。朱熹行文,“大率只是平和而意自长”,语出胸臆,娓娓道来,如风行水上,略无滞碍,不费安排。屠隆论文,尝以为“卑者单弱而不振,高者诘屈而聱牙,多者装缀而繁芜,寡者率略而简易”<sup>[4]卷二三</sup>。朱熹之文,虽无搥金伐鼓之声,亦无暗弱萎靡之态,总是一派冲夷和穆气象。其文脱略鄙俗之质,从不作高深艰危之语,毫无装点修饰,直以明净畅达取胜,故无卑者之单弱,高者之艰涩,亦无多者之夸饰、寡者之率略,淡而有味,质而实绮,臞而实腴。神采骨力,隐隐而在,与其宗主气派密合无间。李慈铭对朱熹的文章颇为欣赏,高度评价其“明澗晓畅,文从字顺,而有从容自适之致,无道学家迂腐拖沓习气”<sup>[5]864</sup>,朱熹文章的主要特色,诚如李氏所言,源于创作态度的“从容自适”。

朱熹行文的从容平和,首先来自于他的自信,来自于他对义理的体认与把握,来自于道学气象的自然流露。朱熹认为“合天地万物而言,只是一个理”<sup>[1]卷一,114</sup>。他所认定的理弥天漫地,涵盖始终,无所不在。既然万事万物都由天理化育而成,那么无论言政、省赋,还是任贤、治军,首要工作就是正心明理。后人认为道学家弘扬义理,强调正心诚意,是“风痹不知痛痒”<sup>[6]卷一,8</sup>,是迂腐不切世物。殊不知在朱熹等人看来,正心诚意明义理,并非与世事毫无关

\* 收稿日期:2007-04-20

作者简介:闵泽平(1969-),男,湖北宜昌人,浙江海洋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研究中国古代文学。  
基金项目:浙江教育厅高校科研项目“南宋理学家文章研究”(20061129),项目负责人:闵泽平。

涉,而是处理所有事务的基础。在《壬午应诏封事》中,朱熹极力描述了当前岌岌可危的形势:“祖宗之境土未复,宗庙之黜耻未除,戎虜之奸谄不常,生民之困悴已极,方此之时,陛下所以汲汲有为,以副生灵之望者,当如何哉?面临如此严峻的形势,朱熹认为查漏补缺均于事无补,必须正本清源,从根本上厘清思路,即“圣躬虽未有过失,而帝王之学不可以不熟讲也;朝政虽未有阙遗,而修攘之计不可以不早定也;利害休戚虽不可遍以疏举,然本原之地不可以不加意也。盖学不讲则过失萌矣,计不定则阙遗大矣,本不端则未流之弊不可胜言矣”。朱熹所说的“本原之地”,就是“讲学”,具体而言就是要“正心诚意”。朱熹的这一奏疏,洋洋洒洒,有数千言之多,均在探讨“天下之大本”与“今日之急务”。在《庚子应诏封事》中,朱熹以类推的方式进一步强调了“正心”的主导地位:“天下国家之大务莫大于恤民,而恤民之实在省赋,省赋之实在治军。若夫治军、省赋以为恤民之本,则又在夫人君正其心术以立纪纲而已矣。”在《戊申封事》中,朱熹明确地指出所谓天下之大本,即为正人主之心。而功利之说则只能快一时之意,得眼前之利,而无久远之益。

总之,朱熹把他所宣扬的义理当作万物之本、万理之源,故其说理往往有高屋建瓴之势。苏洵说:“孟子之文,语约而意尽,不为巉刻斩绝之言,而其锋不可犯。”<sup>[7]</sup>朱熹之文,虽不如孟子气势磅礴、文辞奔放,也很少言近旨远、守约施博,但无峭折流利之习,行文简易而意气凛然,不动声色而林茂深严,使人难以辩驳。和孟子一样,这主要得力于他善用他所认定的尧舜之事、圣人之言和以往典籍来证理,善于占领论证的制高点,善于利用多种手段来阐发其理。归有光《文章指南》说:“韩公作文专占地步,如人要在高处立,要在平处坐,要在阔处行。”朱熹作文亦是如此。他牢牢把握义理,所言所论,无不由此延伸开来,如同为天立心,代圣人立言,这样便是站在高处、坐在平处、行在阔处,立论颇占地步而“其锋不可犯”。不过,同样是“其锋不可犯”,孟子显示出的却是刚烈,朱熹表现出的却是温和。他更从容地陈述自家主张,即使在急迫之时,也不改其平易委婉之态。

理学家所追求的道德修养的至高境界,是温厚平和,清心寡欲,无怨怒激发。文章作为文人道德修养的外现,也当以中正平和为高。朱熹借批评王安石书法而非议其人格:“张敬夫尝言平生所见王荆公书,皆如大忙中写,不知公安得有如许忙事。此虽戏言,然切实中其病。今观此卷,因省平日得见韩公书迹,虽与亲戚卑幼,亦皆端严谨重,略与此同,未尝一笔作行草势。盖其胸中安静详密,雍容和豫,故无顷刻忙时,

亦无纤芥忙意。与荆公之躁扰急迫,正相反也。书札细事,而于人之德性,其相关有如此者。”<sup>[8]</sup>跋韩魏公与欧阳文忠公帖,3957 书札为细事,尚且不能躁扰急迫;文章与德性相连,尤当雍容和豫。

## 一

朱熹行文从容平和,还得力于说理周详,条分缕析,无褊躁之言,无过激之论,不求雄伟,不求奇峭,疏宕袅娜处自有一片烟波。朱熹认为作文当有平常心,无须刻意求工,最基本的要求就是必须有条理。“据某意,只将那事说得条达,便是文章。”<sup>[1]</sup>卷一三七,4261 “作文何必苦留意?又不可太颓塌,只略教整齐足矣。”<sup>[1]</sup>卷一九七,4316 但他所谓“条达”、所谓“整齐”,虽只是文章的基本标准,却也不啻为文章的至高境界。要达到文章的条理化,就必须内容充实、议论平正,不可架空危行、信马由缰。在朱熹心目中,符合这一标准的作家显然并不多,其中之一便是欧阳修。“作文字须是靠实,说得有条理乃好,不可架空细巧。大率要七分实,只二三分文。如欧公文字好者,只是靠实而有条理。”<sup>[1]</sup>卷一九七,4315 苏轼能够说得“明快”,滔滔汨汨,一泻千里,却是“雄健有余,只下字亦有不贴实处”、“大势好,不可逐一字去点检”<sup>[1]</sup>卷一九七,4305。朱熹既然把内容的充实与表述的条理作为行文基本要求,故其散文文势沉稳庄重,显得温和从容。

作为南宋最重要的思想家,朱熹最关注的是思想界的动态。朱熹文集中序文达两卷之多,大致可归为两类:一类序作者之意,置于书前,意义与跋相对;另一类为赠序,为送行之作。前者极为实用,在朱熹文中更为常见,“序古书、序县府志、序诗文集、序政书、序奏议、族谱、年谱、序人唱和之诗”等,不一而足。其中分量最重、影响最大的是经义序。朱熹欲集理学之大成,必须对当时思潮进行全面清理,具体途径就是整理典籍。关于《论语》的编著是他所做的最初尝试,《论语要义目录序》陈述了思想界混乱带来的危害,所以他“遍求古今诸儒之说”以补辑订正。但《论语要义》“训诂略而义理详,初学者读之,经之文句未能自通,又当遍诵诸说,问其指意,茫然迷眩,殆非启蒙之要”<sup>[8]</sup>论语训蒙口义序,3614,所以他又编纂了《论语训蒙口义》。二程著作是南宋理学的重要源泉,但程门弟子“各自为书,先生没,而其传寔广,然散出并行,无所统一。传者颇以己意私窃窜易,历时既久,殆无全编”<sup>[8]</sup>程氏遗书后序,3624,对二程思想的梳理是朱熹建立道统的重要一环,他一方面突出要旨,另一方面删除杂芜,使“读是书者,诚能主敬以立其本,穷理以进其知,使本立而知益明,知精而本益固,则日用之间,且

将有以得乎先生之心，而于疑信之传可坐判矣”<sup>[8]</sup>程氏遗书后序，3625，使“学者察言以求其心考迹，以观其用，而有以自得之，则斯道之传也”<sup>[8]</sup>程氏遗书附录后序，3625。朱熹《周子太极通书后序》所言“先生既以手授二程”、《再定太极通书后序》所言“程氏之书亦皆祖述其意”，表明他通过对周敦颐著作的清理，使其道统谱系明晰而完整。整理四书更是贯穿朱熹一生的重大事件，其每一阶段的思想演变都在《论孟集义序》、《中庸集解序》、《大学章句序》、《中庸章句序》等经义序中得到集中体现。此外，朱熹还力图通过对历史文本的整理来阐述其义理，《资治通鉴纲目序》与《八朝名臣言行录序》都强调了他经世致用的宗旨，《诗集传序》、《楚辞目录序》等则表达了他基本的文学立场。

朱熹这类序文学学术色彩颇浓，多概括，多简述，言约意丰，往往寥寥数语便将思想演变脉络或版本流传经过勾勒出来，用语质朴，语气平和，旨意显豁，以识见取胜。即使那些应人之请所作的文集序，不无呜咽之音，重心依然在思想的评判上，显示出他特有的价值取向。如张栻与朱熹过从甚密，交谊殊深，两人切磋论辩颇为相得。张栻卒后，朱熹应其弟之请而为序，抒发了知音顿失的怅惘之感，但大量篇幅还是在梳理张栻思想的传承与源流、评价其思想的纯正与影响的深远等。显然，在朱熹看来，只有将事物的来龙去脉、思想的传承演变交待清楚，给予深入分析与准确评判，才能避免蹈空之语、泛泛之论，才能做到“实而有序”。其序经籍如此，序文集如此，序语录、序奏议莫不如此。朱熹对曾巩之文一向褒扬有加，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曾巩的文字“实而有序”。他反复说“南丰文字确实”，“南丰文却近质，他初亦只是学为文，却因学文，渐见些子道理。故文字依傍道理做，不为空言”<sup>[1]</sup>卷一三九，4308，朱熹受其浸润，文章也多是“依傍道理做，不为空言”。

朱熹一生亲历政事并不太多，但他总是尽可能抓住每次觐见机会上书言事。不过由于这些奏疏往往以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为主旨，故后人多以为是架空之论、迂腐之言。其实这对朱熹而言是极为草率的评判。朱熹所言固然以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为起点，固不无太淡而无味者、迂远而不切者，但其所论又远远不囿限于此。朱熹壬午上疏，既论以讲学为立身之本，再论以备战为当前之要，最后归结于以任贤为治国之术。其间论和战、论任贤，无不切中肯綮。如其对和议的剖析，就极为精确周密，可谓细致入微。作者先指出我与金人不共戴天，势不可和。然后再针对“和议”出现的种种借口一一抨击，指出和议政策不仅

是对我方士气的极大挫伤，更是养虎助患，最终“我方且仰首于人，以听和与不和之命。谋国者惟恐失虏人之驩，而不为久远之计。进则失中原事机之会，退则沮忠臣义士之心。盖我以汲汲欲和，而志虑常陷乎和之中，是以跋前疐后，而进退皆失”<sup>[8]</sup>壬午应诏封事，575。隆兴和议以来，“天下之人无贤愚，无贵贱，交口合辞，以为不可”<sup>[8]</sup>戊午说议序，3618，其间不乏剝切之论，但多为愤激之言，“诟詈唾斥”，近乎叫嚣。而如朱熹将和战之间利弊、益害分析得如此透彻周详，却也不多见。又如“任贤”之说，为汉以来老生常谈，但朱熹将此拈出，反复强调，实则抓住了南宋政治生活中的核心问题之一，富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北宋党争频繁，是非难辨，正邪不分。延绵至南宋，此祸不绝，官吏多随俗苟且、敷衍塞责。朱熹有感而发，力主在分清正邪基础上，整顿吏治，慎选贤才，“任贤相，杜私门，则立政之要也；择良吏，轻赋税，则养民之要也；公选将帅，不由近习，则治军之要也”<sup>[8]</sup>答张敬夫，1112。朱熹论省赋、论理军、论养民，都不无真知灼见。尤其论救灾之道，具体而微，历历可法。总之，朱熹论说文中的从容，并不完全得力他的哲理涵养及对经籍的谙熟，其对社会生活的密切关注，亦是重要源泉。而后者，或许可使他免遭“空疏肤滥”之讥讽。

与其说理周详相关联的，朱熹行文的从容还来自于他论述的充分与透彻。柳宗元之文以简古著称，刘禹锡曾说“其词甚约，而味邈然以长”<sup>[9]</sup>答柳子厚书，915。《封建论》是柳氏名篇，是其文集中少有的宏阔雄俊之文，但朱熹犹嫌它铺陈得不够充分、论述得不够周详。“柳文局促。有许多物事却要就些子处安排，简而不古，更说些也不妨。《封建论》并数长书是其好文，合尖气短，如火火忙火急来说不及，又便了了。”<sup>[1]</sup>卷一三九，4298朱熹之文不免道家拖沓之习，但绝少迂回吞吐、欲言又止，往往极力阐述，反复分析，必将文意写透说尽而后止。其《壬午应诏封事》、《庚子应诏封事》、《戊申封事》、《己酉拟上封事》等，均为长篇大论，甚者长达三、五千言。所论无非正心诚意、辅翼太子、选任大臣、振举纲领、变化风俗、爱养民力、修明军政等常见论调，并无新人耳目之说。但其每论一事，定要左说右说，粗说细说，反复渲染，将自己的观点展露无遗。长期的学者生涯更使他养成了辨流溯源、广征博引的习气，如其奏疏反对“议和”，却先将“和议”之说产生的种种心理抉露出来；其论“任贤”之必要，又先将权臣污吏的种种胡作非为一一铺陈；而论“讲学”，更是动辄从上古道来，遍引尧舜之事、圣人之言，又一一剖析前代得失。他尤其善于利用两两对勘的方式，如论和战之策，则说尽备战之益与和议之

弊，使人主自择；论讲学，又说尽正心之用与邪说之害，使人主警醒。当然，过分求全、求详，毫无余味，自然会带来文风的贫弱、冗滥。朱熹之文，也难免此弊。

### 三

朱熹行文的从容自适，更得力于他出语的平易朴素。朱熹论文，力主用字平常。他说：“前辈用言语，古人有说底固是用，如世俗常说底亦用。后来人都要别撰一般新奇言语，下稍与文章都差异了，却将差异底说话换了那寻常底说话。”<sup>[1]</sup>卷一三九，4316“不知古人为文，大抵只如此，那得许多诧异。”<sup>[1]</sup>卷一三九，4297“今人作文，皆不足为文。大抵专务节字，更易新好生面辞语。”<sup>[1]</sup>卷一三九，4312他认为作文最关键的是文风要端正：“大率古人文章皆是行正路，后来杜撰底皆是行狭隘邪路去了。而今只是依正底路脉去做将去，少间文章自会高人。”<sup>[1]</sup>卷一三九，4293他所谓邪路显然就是刻意求新求奇，故作艰深，棘人喉舌；而所谓正路，就是力求简易明白，文从字顺，如不假思索，脱口而出。无论《楚辞》还是《史记》，均可作为这方面典型：“《楚词》平易，后人学做者反艰深了，都不可晓”<sup>[1]</sup>卷一三九，4291，“想只是信口恁地说，皆自成文”；“当时如苏秦、张仪都是会说。《史记》所载，想皆是当时说出”<sup>[1]</sup>卷一三九，4289。在朱熹看来，不仅古文行文如此，即使今人文章妙处，也往往在此。“张子韶文字沛然犹有气，开口见心，索性说出，使人皆知。”<sup>[1]</sup>卷一三九，4310这是他反复摸索与实践得出的结论，所以朱熹的文章，往往也是如与人对坐晤谈，言其所欲言，浅易顺畅，丝毫不见艰涩之语、炫目之辞。这一特色在其书信中表现得最为突出。

在古文诸体中，书信最能见出作者心情，这是由书信性质决定的。朱熹一生所写书札数以千计，内容极为丰富，或陈时政，或讲学问，或叙写事情原委，或抒发离别幽思。语气也不尽相同，有仰视、平视、俯视之别。但无论何者，都写舒缓从容，不躁不褊，出语质朴，“辞若对面”。如《答张敬夫书》之一、之二，对“廷臣之狡险逢迎、软熟趋和”，“民心内摇，仇敌外侮”等现状忧心如焚，但与陈亮诸人不同的是，即使心中感愤郁勃，盘桓不已，在信中依然态度从容地述说自己的见解与感受，如“近年此辈皆以货赂依托幽阴而得兵柄，漫不以国家军律为意。今日须为上说破此病，进退将帅须以公议折中，与众共之。则军不待自练而精，财不待自节而裕矣。此张皇国威之本，不可不早虑也”。信中无急迫之词，无矫激之意，无粗鹫之语，所发唯恐“多暴露而少含蓄”，唯恐“涵养本原之功未至”。林纾认为书信“所贵情挚而语驯，能驾驭控制，

不致奔逸、奋其逸足，则法程自在，会心者自能深造之也”<sup>[10]</sup>68。朱熹之文确乎能将“情挚”与“语驯”两者完美结合，既充分传达出内心感悟，又不失于豪宕悍厉，如山之出云、水之赴壑，虽千变万态，莫不自然而然，无丝毫勉强牵合。“朱陈之辨”是历史上著名的公案。朱熹与陈亮二人书信往来，相互辩难。陈亮说到情浓处往往挟愤带怒，不无意气用事。面对陈亮的疾言厉辞，朱熹安之若素，仍心平气和进行解释。朱熹与陆九渊有书信就“无极”等问题展开争论。陆九渊之论，亦多挟棍夹棒，陆派子弟更是“厉色忿词，如对仇敌”<sup>[8]</sup>答诸葛诚之，2540。朱熹在回信中依然耐心逐一解释，反复申说。即使最终无法对话，也表述得极为内敛而伤感：“我日斯迈而月斯征”，各尊所闻，各行所知，亦可矣，无复可望于必同也。”<sup>[8]</sup>答陆子静，1577

### 四

朱熹曾评说陶渊明诗在平淡之中寓有豪放。朱熹之文也并非一味质实，一味和缓，其间多有奇气，亦“自豪放，但豪放来得不觉耳”。他欣赏平正的文风，也不排斥奇伟壮浪。他曾感叹“楚汉间文字真是奇伟，岂易及哉”；认为文章的壮浪是有气骨的表现。他说：“文字奇而稳方好，不奇而稳只是闾鞞。”<sup>[1]</sup>卷一三九，4316可见朱熹行文求稳，却不愿闾鞞，而是奇中有稳，稳中求奇。朱熹文学性最强的文章，往往落尽英华而返璞归真，将俊健奇伟出之于条畅洞达，故人们往往只见其平易坦白，而未见其雄逸豪宕。即以奏疏而论，虽偶有絮叨之态，亦不乏剝切之时，如其言选贤之必要，竟将矛头直指孝宗皇帝与其亲密之臣。李涂所言“晦庵先生诸文字，如长江大河，滔滔汨汨”<sup>[11]</sup>78，即针对此类作品而言。朱熹这些书疏之作，直言是非，论断斩截，不用譬喻，不用影射，一意到底，毫无回护，出语朴素直捷，不用典，不讲究修辞巧妙，而是言从心出，直来直去，惟求辞达理畅而已，但作者却是以气运之，硬健质直，与爱国志士的骨鯁之作并无二致，颇有电发霆击之势。而大量排比句、反问句的运用，也是气盛言宜，更助长了文章的疏宕之气，增添了文章顿挫之美。

朱熹论文，要求文风平易晓畅。但他又深知平易明白不等于平铺直叙，平淡不是枯槁，不是淡而无味。“欧公文章及三苏文好处，只是平易说道理”，但同为平易说道理，“东坡文字明快，老苏文雄浑，尽有好处”，“欧公文字敷腴温润”，“欧公文字锋刃利，文字好，议论亦好”，“虽平淡，其中却自美丽”<sup>[1]</sup>卷一三九，4306。曾巩虽以平正最为朱熹所欣赏，不过他的过分质实还是让朱熹无法接受：“曾文一字

挨一字，谨严，然太迫。”<sup>[1]</sup>卷一三九，4299 总之，朱熹所标举的平淡与从容，看似平易无奇，却是英华醞郁，幽深隽永，是冲淡恬静而非枯淡瘦硬。雍容平和是他行文的终极目标，但这目标的实现并非来自毫无内蕴的叙说，而是历经料简刮摩。朱熹曾称赞巩仲至记文甚健，说尽事理。但又希望他更考欧曾、遗法，料简刮摩，使其清明峻洁之中，自有雍容俯仰之态，则其传当愈远，而使人愈无遗憾矣。而后者不仅是其作文的理想境界，更是其文风最为生动与准确的形容。如其《百丈山记》写登石台所见之景，一反往常之素淡。瀑布的恢宏、石台的崔嵬、云海的奇幻等以浓墨重彩绘出，鲜活明丽，历历如在眼前，将作者开阔之胸襟展露无余。而此前写石磴之险要、石梁之幽深、涧水之清澈、石屋之小巧、石阁之清寂，又是淡笔勾勒，语简意闲，神定气和，充分传达出朱熹萧散超逸之情调韵致。作者着墨或浓或淡，文章色彩或浓或浅，无不随其所宜，如自然天成。真可谓“清明峻洁之中，自有雍容俯仰之态”。笔调纾徐，趣味隽永，实非平铺直叙、一览无遗之游记所堪比拟。

艺术风格的平淡、行文的从容不迫，源于胸襟的恬淡、志趣的淡泊、心智的宁静。朱熹对“闲淡高远”之作赞不绝口，认为萧散的意象、幽洁的境界往往为作者“高风余韵”的外化。因此，他极力强调要“洗涤得尽肠胃间夙生荤血脂膏”，“使方寸之中无一字世俗言语意思”<sup>[8]</sup>答巩仲至，3095，要胸无芥蒂，心畅气和，高明纯一，淡泊自守。只是朱熹强调虚静明澈，却不主张堕入虚空，如枯井空潭，了无生趣。故其文章，并非全为道学家正襟危坐笃实之作，其间不乏灵机妙趣，不乏幽情逸思，不乏嬉笑怒骂，情感自是浓烈。如其《送郭拱辰序》，先写郭君画技高超，烘托出自己的“麋鹿之姿，林野之性”，后写他将出游，欲画隐君子之形以归，而以郭君不能从行为憾，隐约透露出国土日蹙、贤人在野之意。语短意隽，余韵无穷。故林云铭说：“从写真小技中发出如许大想头。盖彼时幅帙日蹙，其东北三面，可一览而尽。贤人遁迹，仕路一空。欲

图其形，正以见其皆‘麋鹿之姿，林野之性’，与己相类也。语虽壮而实悲，要于言外得之。其笔法从《史记》中得来。”<sup>[12]</sup>所谓《史记》笔法，实则是以情纬文，不为枯淡之语。其广为传诵的《记孙魏事》，也是深得其中旨趣，不露声色，却将孙魏谄媚金人、卖国求荣的嘴脸刻画得入木三分。

朱熹之文，情感最为外溢的还是书信之作。数以千计的书札中，多告诫，多讲论，多辩驳，多劝勉，多训斥，总之，理学大师的气象颇为常见。但在与友朋故旧的书信中，他幽默风趣的一面也得到显现，甚至失落、黯然乃至忧愤的心态都有所暴露。刘勰在《文心雕龙·书记》中说：“详总书体，本在尽言，言所以散郁陶，托风采，故宜条畅以任气，优柔以悻怀；文明从容，亦心声之献酬也。”朱熹之文，确实是“文明从容”，吐露心声。其间多“优柔以悻怀”，多舒缓温和之辞，但亦有任性使气之作。也许正是因为这样，他才能充分抒写其离惊积闷，传达出其郁愤，使后人才得以追踪其风采之仿佛。

参考文献：

- [1] 黎靖德. 朱子语类[M]//朱子全书.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 [2] 周亮工. 尺牍新钞[M]. 上海:上海书店,1988.
- [3] 钱穆. 朱子新学案[M]. 成都:巴蜀书社,1986.
- [4] 屠隆. 文论[M]//由拳集.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 [5] 李慈铭. 越缙堂读书记[M].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
- [6] 陈亮. 上孝宗皇帝第一书[M]//陈亮集. 北京:中华书局, 1974.
- [7] 苏洵. 上欧阳内翰第一书[M]//嘉祐集. 北京:中华书局, 1987.
- [8] 朱熹.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M]//朱子全书.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 [9] 陶敏,陶红雨. 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M]. 长沙:岳麓书社, 2003.
- [10] 林纾. 春觉斋论文[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 [11] 李涂. 文章精义[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0.
- [12] 林云铭. 古文析义:卷一五[M]. 宣统元年校印本.

责任编辑 韩云波

## On Zhu Xi's Style of Writing

MIN Ze-ping

(School of Humanities, Zhejiang Ocean University, Zhoushan 316004, China)

**Abstract:** Zhu Xi claimed that writing was his least favorite. However, he was actually a well-known master of writing i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His petition to the throne was concise but powerful, plain but persuasive. The prefaces he wrote were analytical, candid, clear and elegant. Moreover, his articles elucidated views clearly and comprehensively without any pretence or flowery diction, reflecting his mastery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Zhu Xi; graceful; article; gentle; Chongyi(peaceful)